



【经济研究】

近代山东庄移民经济与关中经济的交融发展

张 洁,樊志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通过对山东庄移民动因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揭示其对近代关中经济发展的影响。调研发现,关中山东庄主要分布在关中渭河两岸,它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原因,是晚清自然和社会生存环境恶化的产物。关中地旷人稀的自然条件和宽松的移民政策为移民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作物新品种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及和谐的社会环境是移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作为近代关中经济的组成部分,山东庄移民经济对回乱后关中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关中山东庄;移民经济;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0)04-0091-06

历史上山东地区自然灾害频仍,清代有“闯关东”之俗。自清末光绪年间始,一些山东人断续西迁陕西,聚居在关中渭河两岸,他们至今仍说山东话,保留着山东的风俗习惯,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关中“山东庄”。目前“闯关东”的研究资料颇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但对关中地区山东移民的研究却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本文拟在史料和调研基础之上,考察山东庄的成因、分布,探索山东庄移民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对关中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鲁人入陕的移民动因考察

早在19世纪,美国社会学家莱文斯坦(E. G. Ravenstein)就对移民规律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左右人口迁移的动力是推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力”是指原居地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排斥力,可以是战争、动乱、天灾、生态环境恶化等对某一地区具有普遍性影响的因素。“拉力”则是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可以是大量呈现的新机会,也可以是仅仅对于某一小群体的特殊机遇^[1]。鲁人入陕亦是这双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 推力:灾荒战乱致生存条件恶化

晚清山东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频仍,据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中《黄河流域六省历年灾荒表》统计,道光二十七年(1847)至宣统二年(1910),山东平均每年有47州县受灾,是黄河流域发生自然灾害最多的省份^[2]。1898年山东黄河决口,30余州县中当时溺毙者5万人,饿毙者不计其数^[3]。改道后的新河道常年泛滥,加剧了洪涝灾害和土壤盐碱化,齐鲁大地民不聊生。

晚清山东地区除了灾荒,还有战乱。改道之前,黄河是阻挡太平军和捻军北进的一道天险,也是清军防守的重点,当时尽管捻军在黄河以南的苏北、皖北、豫东一带活动频繁,但山东南边诸县皆在黄河以北,少受侵扰。改道后,捻军北进再无不可逾越的屏障,山东遂成为捻军活动的主要区域。黄河改道给鲁西北民众带来了灾荒饥馑和战乱,官府又置民于不顾,肆意勒索,咸丰十一年(1861)春,鲁西北爆发白莲教起义。一系列灾难袭来,迁移逃荒成为生存的需要,部分贫民在破产逃荒中来到陕西。

收稿日期:2009-09-29;修回日期:2010-01-08

基金项目: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基金(07G002Z)

作者简介:张洁,女,陕西三原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生,从事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研究。

（二）拉力：两地人口密度和耕地占有面积的差异及政府有组织的移民行动

鸦片战争时，山东人口剧增。在人口高压下，山东土地不负重荷，成为典型的“狭乡”。省内耕地根本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再加上土地兼并，多数土地集中在地方富豪手中，人民逃亡京畿近地及边外各地甚多。同一时期，陕西爆发了回民起义，关中是战乱中心，之后短短六七年间，陕西全省人口死亡约466万，整个关中地区人口损失约45.8%，加上光绪初年大旱，省内人口累计损失达710万^[4]，陕西全省特别是关中地区大量肥沃土地闲置荒旷，也使陕西成为所谓的“宽乡”。秦鲁两地的人口和耕地占有面积出现明显差异后，出于农业社会本能生存的“逐地性”需要，为获取更多的土地，一些山东人为“稻粮谋”，自发由狭乡迁往宽乡，移民来陕求生。

移民动机除了经济原因，政治因素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在民间自发趋利移民的同时，回民起义后，政府为尽快恢复生产，设法招徕外地平民来陕垦殖。“丁丑奇荒”年间，时任三原、临潼知县的焦云龙（1840—1901，山东长山人）建议朝廷从山东、湖北等省向陕西移民垦荒，并亲赴山东老家，动员青州府一带5000多口农民移居陕西，这些移民成为关中地区山东移民的主体，政府的参与进一步加快了鲁人入陕的速度。

二、山东庄的形成和分布

（一）山东庄的形成

山东人移民关中之初，封建社会保有土地的本能“欺客”现象使山东移民无法直接获得土地，融入本地村落居住，于是他们在田间地头搭棚或掘挖土窑聚居，以垦殖荒地和租种当地人的土地为生，长久便聚落成村，形成了“山东庄”。

据调研，关中地区的山东移民主要来自山东的青州府和曹州府，即昌邑、莱芜、淄博、博山、寿光、高密、益都、长山、博兴等地；曹州府和青州府居于鲁豫交界之地，距陕路途较近，加上朝廷导引，当时多为举族迁移。继焦云龙移民之后，山东移民和原驻地人基于亲情、友情建立了“移民网络”，在血缘、乡缘、情缘地推动下^[5]，不同历史时期先后有更多的山东人因战乱、饥荒的原因，以“亲戚引亲戚”的方式迁移至关中，使山东庄村落规模以宗族为中心扩大，带有明显的地缘和血缘特点。

（二）山东庄的分布及人口估算

据调查，山东庄主要分布在渭河沿岸的三原、高

陵、阎良、临潼等区县，在渭北的富平、大荔、渭南、蒲城等县也有不少山东人的村子。总体来讲，山东庄集中分布在陕西最为富庶的关中地区。三原县山东庄主要分布在城关镇、新庄乡、安乐镇、陂西镇、独李镇、大程镇、西阳镇、徐木乡、渠岸乡、高渠乡。这些乡镇山东庄密集，有些整村都是山东人，有些村子山东人占到一半以上。富平县比较大的山东庄有牛村、太平庄、安乐村、杨村、吴中洼、义和村、闫村、凉水井等。阎良也是山东人的聚居区，有60多个山东庄。除此之外，韩城、眉县、周至、耀县等地也有零星分布。

起初，关中地区将山东人聚居的村庄都叫山东庄，后来才起了名字，名字源于以下方面：（1）以最早迁移者的姓氏命名，如谭家堡、金家窑。（2）以新立的村子命名，如新立村、新建村。（3）沿用地方位和故乡地名命名，如东来村、东新村、长山村、昌邑村。（4）取“义”或“和”，有齐心协力、团结一致之意，如和平村、仁义村。从中可见山东庄形成的历史文化印迹。

关于山东庄的人口数量，有人说已经百万，显然言过其实；还有一说为二三十万人。据《阎良县志》记载，1995年，生活在该区的山东籍人口达10077户，占全区总人口40741的25.8%，这是目前能得到的山东移民的惟一确切数据。笔者在三原县调研时，三原人的共识为：山东移民占三原县总人口的10%—15%左右，也就是五六万人。三原县是山东人聚居较多的地方，其他各县略少于三原，但平均数量相当，按平均每县5万人推算，山东庄移民总数应近40万，推算为30多万比较合适。

三、山东庄移民经济发展之原因

山东移民入关中正值回乱之后，当时的关中经济一片凋敝，农工商均受重挫。山东移民的到来，适时补充了战乱损失的人口，同时他们带来了山东地区先进的作物品种和生产技术，借助关中地区良好的自然社会条件，实现了移民经济的发展。

（一）地旷人稀的自然条件

土地是农民生存和进行农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山东移民到达关中时，回民“叛产”，悉数荒废，被朝廷清查的“叛产”土地超过2万顷，约占战前陕西全省田地总数的1/10^[6]；在回乱最严重的城镇周围，许多汉民为了躲避战乱也弃田而逃，造成大量“民荒”。尽管有朝廷的政策保障，但当地汉人惧怕回人日后返回报复，不敢耕种回民的土地。于是山东移民初到关中便得以定居在各城镇周围，占据了

关中平原最富庶的地区,并且很容易就获得了生存所需的肥沃土地。然而,在三原县的山区和塬区却没有山东庄。究其原因,清末当地汉民为避回乱,被迫辍荒逃往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塬区和山区生存,至今在三原塬区还可看到汉民为避回乱而凿的窑洞。所以,和闯关东不同,尽管同为灾荒移民,山东庄移民比较容易解决了生存必需的土地问题,承担的移民风险较低。

(二) 清廷宽松的移民政策

回乱后,清政府为尽快恢复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对外召垦。同治五年(1866)清廷允准陕西巡抚刘蓉所奏的陈荒章程,规定:第一,正经界。将“叛产”、“绝产”划分段落,勘测大量,编立字号,查明应募客民履历,发给执照,按地段次序授田耕种。第二,定限制。对于“叛产”,一律没收归官;对于“绝产”,以三年为期限,业主逾期不归,田产照例入官。如果应募客民在六年之内,按规定完纳租粮,即将官田变为永业田。第三,缓钱粮。水田头年免租,仅纳正粮;旱田租粮俱免,次年再升科。第四,定租谷。每亩每年收取一定租谷,六年后一律免收租谷,按照定额交纳正粮。同时各州县也出台了一些鼓励移民垦荒的措施。富平县在光绪六年(1880)以后,“当事筹划垦辟,遂仿南山诸邑招集客民开垦例。”^[7]泾阳县对“叛回产业”,也多以“安插难民”的方式“招民承种”。这些政策有效促进了移民垦荒,也使山东庄移民得到了土地保障。到光绪十二年(1886),关中地区移民垦殖荒地近10 000顷,人口密度也恢复到每平方公里百人以上。

(三) 作物新品种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

清代时,齐鲁大地的农作经验和农作方法已与关中地区不分伯仲,又因临近沿海,受资本主义萌芽和开埠通商的影响,经济作物种植更优于关中地区。

1. 引种美烟 山东是我国引种美烟最早且成效最大的省份之一。19世纪初,华商南洋烟草公司以青州为中心大面积推广种植美烟,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美烟成为当地种植的主要烟草品种。山东人移民关中后,美烟逐渐取代关中地区传统的土烟,一是因为关中平原的自然环境适宜美烟的种植,二是种植美烟可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当时普通烟农种美烟一大亩,“可收三百元,除去成本,剩余二百元,可购地一亩,小农多趋之。”^[8]美烟种植得以在关中平原各县迅速推广。

2. 种桑养蚕 山东是我国柞蚕生产的发源地。入清以后,山东柞蚕人工放养技术进一步完善成熟,

形成了从择育蚕种到人工植柞的一整套技术,放养地区和生产经营规模都不断扩大,柞蚕及放养技术也在全国传播推广。山东移民入关中后,柞蚕放养技术进一步在关中地区推广。同一时期,陕西地方政府也大力推广植桑养蚕。由于政府的鼓励措施和山东移民带来的植桑养蚕技术,关中蚕桑业在清末一度繁盛。

3. 种植油料作物和园艺作物 关中地区渭河沿岸多沙地,山东位于黄河三角洲,两地广种花生。关中地区种植的多为传统小粒花生,产量低;当时山东已引进美种大花生,临沂出产“落花生大小两种,自光绪时,大者盛行,小者几废。”^[8]山东庄移民将大粒花生品种引入关中,其颗粒为小花生的两倍,因易收利厚,出油率高而迅速在关中普及,促进了关中榨油业的发展。除此之外,移民区井灌普及,农业生产能够旱涝保收,除粮食外,他们还种植瓜果蔬菜等园艺作物。其中,西瓜种植面积很大,在西安周边的三原、泾阳等地蔬菜种植也颇具规模。山东庄移民引种的经济作物丰富了作物品种,扩大了关中地区原有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的种植面积,促进了种植业的进一步发展。

4. 移民村落和关中原村落和谐相处 不同的地域在历史上经常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个地域的文化特质,既非造物主的赐予,亦非绝对理念的先验的产物,而是一定的居民在其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积淀而成。这种创造和积淀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深深地植根于自然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土壤之中。”^[9]基于文化的保守性,移民与当地土著之间极易产生冲突,但山东移民村落近百年来却从未和原关中村落之间发生过大的纷争。这是因为山东移民来自孔孟之乡,他们勤劳、朴实、知礼节俭,三原县城关镇著名的山东庄——香油之乡大李村,村中有一石碑,碑文内容正是劝诫村民勿赌、勿烟、要勤劳创业等村规,这些思想理念与关中文化推崇的勤俭豁达有颇多相似之处。其次,山东人豪爽仗义,具有尚武精神。时关中地区多土匪,村落多受之搅扰,山东人体格强健,遇事举村出动,土匪不敢与之抗衡,社会秩序安定不少,周边关中村落也从中受益。第三,山东人重视教育,知书达理。移民李知经在给山东母亲的一份家书中写到:“又定本堡之局,学生十位,修金廿五两。象环亦就馆于王相汉家,学生四位,修金廿两,均是饭局在外者。……儿所以必住谭

家堡者,为学局易成计也。”信中所言他之所以定居谭家堡,是因为这里山东移民聚居,读书者多,便于教书谋生。正因为如此,同为逃荒来陕移民,都是挑担而来,关中人将河南人叫做“河南担”,而称山东人为“山东客”,意为山东人是被陕西人请来的,表现了对山东移民的尊重。

四、山东庄移民对关中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 土地更加细碎化,加快了“关中模式”的形成进程

秦晖利用关中地区的土改资料,对土改前(20世纪40年代后期)关中农村经济社会进行研究,提出了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将“关中模式”的主要特征概括为:地权分散,地主及无地农民均很少;仅有的少量地主多为“经营地主”,很少出租土地;“经营地主”经济中的过密化不亚于或甚于小农……等等。^[10]此后,他又运用“最有力的证据”,即原始的关中地籍文书,发表了《“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国——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史析》一文,认为清初至民国较长时期内关中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土改前一致,即“关中无地主”、“关中无租佃”、“关中有封建”。^[11]他认为“关中模式”的形成因素中主要有两点:一是地权分散,一是雇工多于租佃。除了文中所分析的各种原因,笔者以为“关中模式”的形成与山东庄移民也有相当的关系,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关中模式”的形成进程。

首先,回乱后,山东移民大批涌入,他们占有了很多原回民的土地,关中土地大量易主。在垦荒中,关中可开垦土地有限,移民对新土地的开发能力也不足,所垦荒地仅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并未增加大面积成块的土地。山东移民到来后,土地的重新分配使地权更加分散,关中土地愈加细碎。其次,从首批山东庄移民入关中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每遇黄河泛滥或灾荒战乱之年,便有山东移民来到关中投亲靠友。早期来的移民得到了政府分得的土地,其余人缺乏土地的保障,只有从事手工业生产或者沦为雇工。关中自然经济之古风淳然,民皆亲营畝亩,租佃不兴,而雇工相对活跃,无地的山东移民多做雇工,正好迎合了关中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需要,加快了“关中模式”的形成进程,使得关中地区出现了经济自然化伴随雇佣化的“反常”(就传统而言)现象。

(二) 井灌的发展完善了关中地区的灌溉系统

早在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泾渭流域就形成了以郑国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成国渠等为中心比较

完善的灌溉系统,农田灌溉以渠灌为主。山东历来有井灌传统,临淄地区“亢旱频年,人知灌田之利,富用水车,贫用桔槔”。山东庄移民在农业生产中利用渠灌的同时,更多地使用井灌。这是因为,自明朝中叶始,关中各渠就实行水册制,确定了具有排他性的产权关系,使水资源具有较强的私有产权性质^[12]。这样,渠灌水源都掌握在当地人手中,一旦遇到大旱,水源紧张,山东移民的用水便没有保障。山东庄移民新辟耕地均离渠较远,而田间打井灌溉简便易行,因地势平坦,水层较浅,一般井深10米左右即可用水。井灌还能节约用度,且不受年景限制,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对渠灌水源的依赖。

(三) 农业生产恢复发展,重新奠定了关中地区以粮棉为主的经济格局

关中是陕西最早的植棉区,明代时渭南、富平、华县三地棉花生产已具规模,“富平地沃丰收,又兼木棉布丝之利”,渭南“服用之物,植之品,曰花……河北遍地皆种,东乡尤宜”^[13]。自清道光年间鸦片流入陕西后,陕西“废田而种罌粟,岁益浸广”,之后成蔓延之势,“罌粟较六谷之利略厚,但种必择膏腴之地,恒致春粮减少”,光绪四年(1878),“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央,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罌粟……”^[14]大量烟田侵占农田,造成粮棉面积大幅下降。当时关中人不仅种植鸦片,而且吸食者甚众,而山东移民好习武,身体强健,他们不贪图鸦片种植之利,田地之上不种鸦片,广植棉花。正因为如此,迄止清末光绪年间,陕西植棉又渐次扩大,棉花产量增加,加上洋棉普及,品种改良,关中棉花产量占到了全省的九成以上,促成近代陕西产棉大省的地位。山东人变烟田为良田,重新奠定了关中地区以粮棉为主的经济格局,对淳化乡风民俗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 手工业生产围绕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进行,纺织业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传统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加上新垦土地生产力低下,农业的产出有限。山东庄移民在土地占有及资金积累方面均不如当地农民,因此,他们通过手工业经营以弥补农业产出之不足,主要经营农具制造业、粮食加工业和生活用品加工业。因技术含量较低,从事的农户较多,加工的产品基本靠走街串巷和集市销售。

生活用品加工中首推棉纺。关中地区生产棉花,纺织业盛行,基本家家均有织机。“贫妇值农忙时亦作苦田间,暇则勤织布”,山东妇女更以勤劳著称,只要闲下来便织布。早期的棉织带有自给自足的性质,

棉花为自家所产,土布也多为家人消费。清末,先进的棉纺技术也输入到关中地区。光绪二十三年(1897),泾阳人杨凤轩从上海购进并让人仿制出铁制人力轧棉机;三十二年,张深如从上海购回新法织布机,关中出现了专门的织布作坊,无地的山东移民便在作坊中做雇工,靠织布谋生,三原县的盐店街、山西街就聚集了大量的来自山东的纺织工匠,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雇佣制的生产关系在棉纺业显现。

(五) 构建了以集市为中心的农村商业经济网络,促生了关中商业贸易的再度繁荣

集市是封建小农经济社会进行商品贸易的主要场所,以农业和围绕农业进行手工业经营的山东庄移民,其商业活动基本依靠集市进行,他们将自己的产品拿到集市出售,有时也通过物物交换满足彼此的需要,集市经济是当时山东庄移民所依赖的主要商业经济形式。

随着工商业的恢复,当时关中的市镇经济逐渐活跃,当时西安府和同州府牙行众多,有的还设有行会,仅三原就有斗行、花行、药行、钱行、土行、票行、粟行、估衣行、染行、木行、干菜行、金行、糖果行、烧酒行、京绸行、过载行、猪行、布行、当行、盐行等,涉及各个行业。当时的关中行会之中也有很多山东移民,他们多经营粮食、棉花和布匹,许多商人出省经商,将陕西的粮棉运出,然后再输入布匹赢利。

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资金流向是土地投资,山东庄移民也不例外。出于对土地的迫切占有需求,山东庄移民的剩余资金主要用于置办田地。随着人口逐渐增多,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当时地价已渐长,回民起义及光绪三年(1877)灾荒造成的荒芜景象有所改观。近代关中地区大城市(西安)、市镇和集市三种商业经济形式相互交织,构成了城乡结合的商业网络^[15]。

综上,近代山东庄移民在清末关中经济最低迷

时期,凭借顽强的生命力,通过汲取关中经济发展的养份,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关中经济的发展,对关中经济的恢复和保持近代关中地区的富庶繁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E. G. Ravenstein. The laws of migration[J].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889, 52: 286.
- [2] 李文治.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第一辑)[M]. 北京:中华书局,1977:733-735.
- [3]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等.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Z].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638.
- [4] 曹树基. 中国人口史:第六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5] 张晓青. 国际人口迁移理论述评[J]. 人口学刊,2001(3):41-45.
- [6] 马长寿.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 [7] 光绪富平县志稿. 卷3 风俗[M].
- [8] 山东实业厅. 山东农林报告[R]. 1931.
- [9] 田毅鹏. 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以吉林区域文化为中心[J]. 社会科学战线,2002(6):185-192.
- [10] 秦晖. 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73-4.
- [11] 秦晖. “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国——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史研析[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1):50-67.
- [12] 萧正洪. 传统农民与环境理性——以黄土高原地区传统农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例[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83-91.
- [13] 天启渭南志:卷9[M].
- [14] 曾国荃. 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Z].
- [15] 杜海斌. 略论晚清时期关中市场的发展状况[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114-118.

[责任编辑 卫 玲]

A stud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of immigrants from Shandong Province to Guanzhong plain in Shaanxi Province

ZHANG Jie, FAN Zhi-m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immigrants from Shandong provi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uanzhong plain was revealed by analyzing their migrated moti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urvey shows that villages of immigrants from Shandong Province to Guanzhong plain in Shaanxi Province mainly lie along the Weihe River. It is a result of the worsening of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for peopl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Hui nationalities' uprising in Guanzhong at that time, the native population was decreased,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loosening of land policy, made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mmigrant economy in the area. New crop varieties and advanced techniques were brought in, which, blending with the local ones, enhanced mutual benefit and development of both immigrant and local economie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covery and prosperity of modern agriculture, handicraft and commerce in Guanzhong.

Key words: villages of immigrants from Shandong to Guanzhong; immigrant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agriculture; handicraft; commerce